

# 旅蒙商

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

卢明辉 刘衍坤 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96  
F752.95  
4  
2

XAK04/1P

# 旅 蒙 商

——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  
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

卢明辉 刘衍坤著



3 0116 2513 8

中国商业出版社



C 243047

(京)新登宗 07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

卢明辉 刘衍坤著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5

ISBN 7-5044-2198-7

I.旅… I.Ⅲ.商业经济—经济史—中国—近代 IV.F7

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8758 号

责任编辑:徐祖文

责任校对:映 晖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1995年6月版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9 $\frac{20}{30}$ 印张 239千字

印数1—1000册 定价:10元



卢明辉修改本书稿时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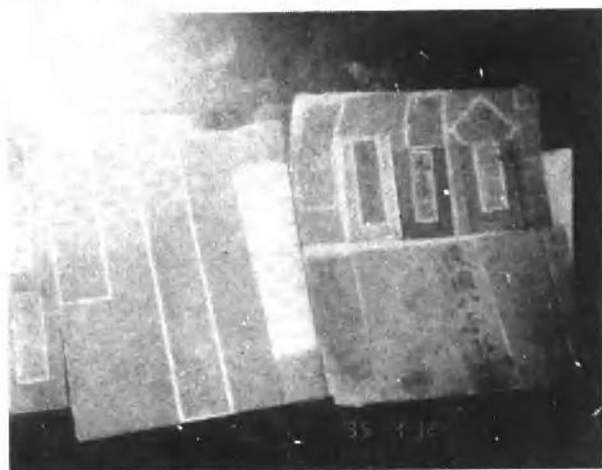
#### 作者简介：

卢明辉：现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1958年致力于蒙古社会、经济、历史调查研究，历任内蒙古历史研究所近现代史研究室主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79年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时被选为理事会理事兼秘书长；并任中国民族贸易研究会理事；内蒙古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内蒙古商业经济学会理事；内蒙古民族贸易研究会理事；（香港）国际华人学友社特约撰稿人、（东京）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会员等。曾应邀出席香港大学主办的“第34届亚洲及北非洲国际学术大会”，并应邀赴日本等进行学术交流访问活动。多次出席国际和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议。

主要著作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北方民族关系史论丛》，1983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牵头主编，与他人合著），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内蒙古文物古迹散记》（主编），1987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清代蒙古史》，1990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中俄边境贸易的起源与沿革》，1991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1994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狄苑探踪》，1994年，中州出版社出版。另外还曾主编和与他人合编出版的有：《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蒙古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四部，均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撰写《“草原丝绸”之路与内亚蒙古地区近代文明》等论文，分别在日本、美国、香港和国内各学术刊物公开发表。近年主要从事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经济贸易关系史，以及中俄、中日等中外关系史研究。



雍正初山西祁县乔家堡农民乔贵华随乡人“走西口”流落在塞外包头，以打工谋生糊口。后受雇于商号当“驼馆”赶骆驼，嗣以小本经营粮、油加工作坊。自咸丰年间乔氏在包头发迹，开设绸缎、百货旅蒙商号和钱庄银号。聚资多达数百万两银，在家乡祁县城始建“在中堂”总号，分号遍布京、津、苏、杭、南京、武汉和张家口等地。成为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号巨富乔“在中堂”。  
图为作者在山西祁县乔“在中堂”大院门前留影。



在包头发迹的大旅蒙商号兼金融业钱庄乔氏“在中堂”的部分帐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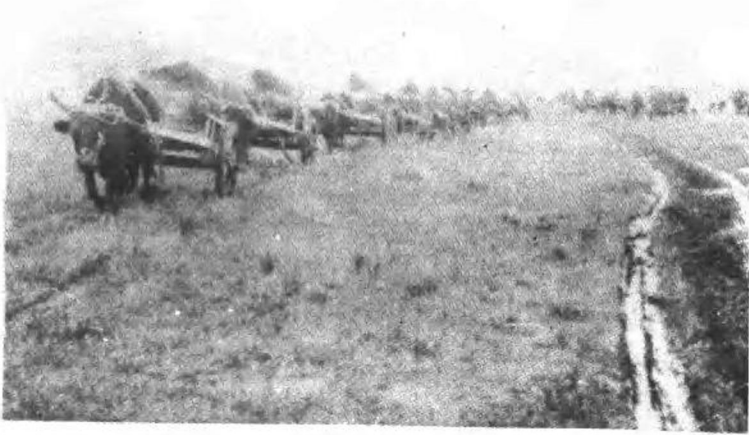
旅蒙商在蒙古三德庙  
的毛皮收购市场



世界著名蒙古 毡毯  
所在地美轮美奂→



旅蒙商在蒙古草原上运输货物的勒勒车队





以“西帮”著称，在塞外蒙古草原发迹的“平遥帮”旅蒙商号、钱庄，在故乡平遥城内开设的商号店铺街景一角。



多伦诺尔旅蒙商号“山西帮”商人会馆院落。



明代宣化是蒙古人与中原商人「马市」贸易的市场。图为著者在明代宣化城古楼前留影。



张家口大境门外是清代旅蒙商与蒙古人贸易的牲畜交易市场。

# 序

旅蒙商，是清代活跃于中国北部蒙古高原地区从事边境贸易的商人、商号和商帮的通称。兴起于17世纪初期，昌盛发展于18—19世纪，消亡于20世纪50年代末。经历了长达300余年的兴衰嬗变历程。旅蒙商活动范围：东起黑龙江中上游鄂温克、鄂伦春等游猎民族聚居地区；西迄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天山北麓的准噶尔部、哈萨克部等游牧边陲旷野；南至长城沿边，北达西伯利亚俄罗斯辖属的部分边境城镇。囊括中国北疆漠南、漠北蒙古各部游牧地带，纵横北疆戈壁草原约240多万平方公里。

中国北部边疆的蒙古高原地区，自明代以后，经历了长期战祸频仍的摧残，又处于与外界完全封闭隔绝的状态，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广大蒙古等游牧民的生产和生活陷入极端困苦的窘境。在此情势下，旅蒙商从中原内地贩运布帛、粮食、砖茶和生产工具等货物到北疆边境地区贸易，受到各族游牧民的普遍欢迎。

旅蒙商中的绝大多数成员是来自颇善经营理财而驰名于中外的“晋商”。其中亦有在清初曾为清王朝肇兴时提供财力和物资有功而赐驻张家口，隶属于内务府的“皇商”，成为“亦官亦商”的封建垄断性商贾。清初，清军为征伐漠北蒙古各部和新疆准噶尔蒙古部封建割据势力，以及抵制沙俄殖民侵略武装，统一北部边疆地区辖境时，旅蒙商均一路跟随为清朝征伐军提供军需粮饷和军马等物资。由于从事随军赴蒙贸易而得名：“旅蒙商”。

旅蒙商不仅经营商品贸易,而且多数商号还兼营钱庄、票号和毛皮加工、粮食酿造,以及各种手工业生产作坊等制造业,是商、工贸和金融资本合而为一的商帮联营组织。其中如归化城的大盛魁等巨贾,还受清朝政府理藩院等官衙门的委托,负有包揽对漠北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将军衙署、驻防戎边清军、卡伦和驿站兵卒等粮饷、物资供应,并代清政府征收赋税等,成为“官商一体”的封建垄断性商号。

清代前期,清政府继续对蒙古等实行封禁隔离政策。旅蒙商不顾清廷的禁令,冒险冲破“边禁”,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将中原地区生产的农业、手工业产品肩挑车载贩运到遥距数千里外的蒙古草地贸易,对长期处于以粗放游牧业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并改善了草原广大游牧民的生活,加深了中原与北疆地区蒙、汉等民族间的情谊;在贸易往来中,还将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文化、科技、医药、艺术等知识引进草原,对游牧民族开阔视野,改变积淀的传统观念,接受新的思想文化信息,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旅蒙商将蒙古草原出产的大量牛、马、羊和毛皮等畜产品,贩运回中原内地销售,为改善城镇居民生活提供了条件,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耕畜,为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和手工业提供了动力和原料,为加强国防骑兵建设,供应了蒙古良种军马和军需装备物资;同时在山西、河北、陕西、甘肃、宁夏等沿长城地带的畜牧业生产日益发展,也是与旅蒙商不断提供畜源和将蒙古游牧民饲养牧放马、牛、羊的经验技术等游牧文化传播分不开的。由此可见,清代以来,随着旅蒙商穿梭往来于中原地区与塞外草原的经济交流,为消除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中原农耕民族与北疆游牧民族间的积怨、隔阂,增进民族间的相互沟通,相互支援,相互依存的友谊关系,进而促进北部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在政治思想上以维护中华民族统一为核心的内向凝聚力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清代以旅蒙商为先导,在中原内地有大量破产、失业的农民、

手工业者等流民群,跟随旅蒙商的足迹,纷至沓来,到塞外草原上谋生定居。这种结夥成群,以数十万计的自然移民,迁徙到边陲北疆后,不仅使昔日空旷无垠的戈壁荒野,逐渐出现了禾田阡陌的农耕村庄,而且在一些从前只有驼铃叮咚的交通枢纽地区,形成了商肆喧闹、作坊林立的新兴城镇。这对发展以牧为主,多种经营的蒙古经济社会新格局,改变单一粗放的畜牧业自然经济落后面貌,加速畜牧业生产发展和边疆草原的开发建设,以及增强抵御沙俄等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巩固我国北疆边部地区版图统一,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充分肯定旅蒙商的历史功绩时,也应看到消极的一面。唯利是图,对旅蒙商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大多采取欺骗甚至掠夺的手段,对蒙古族等游牧民从事重利盘剥,并通过放“印票”赊销等牟取暴利。有关这方面在《旅蒙商》一书中例举有大量事实,并对其恶劣狡猾的经营手段进行了深刻剖析。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卢明辉和内蒙古商业经济学会秘书长(高级讲师)刘衍坤,是长期从事北方游牧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史和内蒙古地区商业贸易的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撰著的这本《旅蒙商》很有特色。全书以翔实、丰富的资料,叙述了旅蒙商由兴起、发展至消亡的历史全过程。单就书中所引用的300余种中外文献例证资料,就不是轻而易举的。该书执笔者卢明辉,不辞劳苦地赴各地查阅和搜集史书、档案和典籍,并追导旅蒙商在内蒙古草原的活动进行调查。在取得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和撰写,其工作量和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对旅蒙商的经营与管理等重要问题,选取了大量具有影响的史实,浓墨加以论述和探讨。这本书论据充足,取材适当,基本上写出了旅蒙商的经营风貌及其特色。

《旅蒙商》研究的主要内容,采取了包含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民族学、社会学、商贸经营学等多种边缘学科在内的比较研究

手段。因此是一本颇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书。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对于以流通为先导,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旅蒙商》是我们研究会组织编写的民族贸易丛书之一,对从事民族贸易职工、理论工作者和商业、贸易大专院校的师生教学,也都是有所裨益的,尤其是对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北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一本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书。《旅蒙商》一书的出版,将会对研究我国民族贸易、边境贸易乃至民族经济的发展史,做出一定的贡献。谨此作序,以兹感谢!

中国民族贸易经济研究会

常务会长 杨德颖

1994年12月 于北京

## 自序

旅蒙商,是17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末(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活跃在中国北疆蒙古高原地区,从事边境贸易活动的商人、商号和商帮的通称。

自14世纪70年代到16世纪中期,元王朝覆亡退出中原的统治地位后,蒙古高原地区各部落封建主之间的内讧纷争,连绵不断。加之,明王朝对蒙古采取“扫穴犁庭”的驱逐征伐战争和实行经济封锁隔绝政策。在长达200余年的“血与火”战祸频仍,社会动乱的环境中,使蒙古高原地区与中原内地和横跨亚欧大陆通达中亚、欧洲各国畅通无阻的商路、驿站荒废了,商贾贸易往来也绝迹了,<sup>①</sup>蒙古社会与外界文明社会的经济、文化交流几乎完全停顿了。蒙古高原地区的各族游牧民历经乱世,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摧残,处于全封闭式的隔绝状态,陷入“爨无釜,衣无帛”极端困苦的境地。直至16世纪中叶,俺答汗(阿勒坦汗)继承其祖父达延汗统一蒙古高原大业后,社会生产力开始得到恢复发展,各蒙古封建主拥有大量畜群和财富,逐渐厌弃兵戈之争的内讧冲突,强烈要求

---

<sup>①</sup> [苏]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峻中译本,19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明王朝允许恢复蒙古高原与中原内地的互市贸易关系。1517年(隆庆五年),明廷准许开放宣化、大同、水泉营(山西)、花马池(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四处“马市”交易。蒙古各部封建主都纷纷组织商队,赶着大量畜群,驮载大批毛皮畜产品和裘皮、土特产货物,前来内地沿边指定互市的榷场与中原内地的官、民商贾,进行贡市贸易,交换粮食、绸缎、绢帛、烟茶、铁釜、瓷器等,建立了“以物易物”交易关系。

蒙古地区与中原内地“贡市”贸易关系恢复后,首先在长城沿边从前为战略要塞城镇,如宣化、大同等地“化干戈为玉帛”,变成商贾云集,商号林立的商埠城市,互市贸易新兴的商城张家口“各行交易铺,沿河长五里许,贾皆争居之”,绸缎、绢帕、布帛等中原和沿海地区迁来商号,竞相从事互市贸易。据万历年间,王鹭绘制的宣化府来运堡《马市图》载:“规方墉地,百货全集,车庐驼马,羊旗毳布……”。在大同和山西杀虎口堡塞等地马市上“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sup>①</sup>“大同地方……商贾辐辏,比之他处有同”<sup>②</sup>，“故城之有南关也，是商贾货财之所凑集”<sup>③</sup>。这充分反映出蒙、汉互市贸易繁华的情景。来自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商贾们，将“至若陆驮水航之物，藏山隐海之珍，靡不辐辏而至者，大都多东南之产，而转贩之力也”<sup>④</sup>可见，从事蒙古“贡市”贸易的商贾，不仅是地缘连接朔漠蒙古高原的晋商，而且有许多来自江南和沿海城市的商人，也争先恐后，云集设铺开肆与蒙古商队交易。据明嘉靖朝编纂的《宣府镇志》载：“先年大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绸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铺、绒绵铺、杂

① 《明世宗实录》卷 558。

②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 42。

③ (顺治)《云中郡志》卷 13。

④ (崇祯)《山西通志》卷 7,“物产”。

货铺、各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sup>①</sup>。但是，仅限于在边城定期开设的“马市”贸易，是远远不能够满足蒙古高原地区各族游牧民和封建王公贵族们日益增长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必需依赖于中原地区供应补充物品的需求。

17世纪以后，随着清王朝重新开创全国各族多员一体格局的大统一政局，蒙古高原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联系更为密切。在沟通促进中原内地农耕经济社会与蒙古高原游牧经济社会之间的频繁交往，传播近代物质文明和文化意识形态文明，加速北部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发展事业方面，旅蒙商，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们经商贸易活动的足迹，从东自黑龙江流域，西迄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南起长城内外漠南蒙古诸部，北抵漠北喀尔喀诸部和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及南西伯利亚诸游牧民族地区。纵横数万公里，穿梭行程遍布内亚蒙古高原旷野辽阔的各地。旅蒙商贸易活动，其历史之悠久，范围之博大，都创建了古今中外边疆民族贸易史上罕见的盛况。

对于在长达300余年历史时期，肩负沟通北部边疆游牧经济社会与中原内地农耕经济社会互通有无，增进中原与边陲汉、蒙等诸民族间发展经济、文化交流重任的旅蒙商，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应当如何评估，长期以来，在我国民族贸易和民族理论界，对其认识褒贬不一。为此，我们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将本书作者自1956年以来，着手进行搜集有关资料、走访调查部分健在的旅蒙商号当事人和当年活动的有关地区，并搜集查阅大量有关旅蒙商的历史文献资料。近年根据中国民族贸易经济研究会的倡议，对于旅蒙商产生的历史条件、活动范围、经营方式、经营商品种类、业务组织管理、重利盘剥和兴衰变迁、历史作用等诸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翔实的论述，这对当前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发建设边陲，

<sup>①</sup> 《嘉靖》《宣府镇志》卷20，“风俗考”。



发展边陲地区的民族贸易和市场经济,加速北疆民族地区的城镇建设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中原汉族与边疆诸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科技等事业的交流发展。以及增进内引外联,发展边境贸易、跨境互惠贸易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同时,为了使广大读者对清代旅蒙商贸易产生以前,中原地区农耕民族与北疆诸游牧民族之间贸易关系的了解,书中将美国蒙古学者扎奇斯钦:《中原农业民族与蒙古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方式与战争》(原载德国汉堡出版《中亚研究》1977年第11卷。)一文,请呼和浩特教育学院副教授郭艳如译成汉文,作为本书附录,供读者对清代以前中原地区与北疆蒙古高原地区贸易方式,以及在贸易关系被迫停止后,引发的北疆游牧骑马民族,发动以战争掠夺方式来获得他们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所必需的各种物品。可使读者对历史上中原地区与蒙古高原地区的民族间贸易关系,窥见一斑,亦有益于对旅蒙商贸易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有进一步的认识。

本书为中国民族贸易经济研究会重点科研项目之一。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明辉(教授)经多年搜集资料,负责拟定编写大纲和全书的撰稿、通稿、修改、定稿工作,为全书著作权拥有者;内蒙古商业经济学会秘书长、高级讲师(原任内蒙古商业学校校长)刘衍坤,为本书倡议撰写者之一,并提供他编撰的“旅蒙商”文稿,为本书提供部分资料,同时参与对本书的审稿工作;内蒙古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昱,也曾参与本书部分搜集资料工作;山西大学副教授冯良珍博士,亦为本书著者赴山西考察搜集资料时,给予大力协助。同时,在本书撰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中国民族贸易经济研究会常务会长、研究员杨德颖先生的大力支持,并为本书写“序”和提供部分出版经费资助。中国商业出版社,为本书早日付梓出版,不辞辛苦,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另外为撰写本书,多年来在搜集资料和调查访问工作过程中,得到内蒙古地区许多盟、旗和北京、大连、山西等地的图书、档案、文史资料等部